

## 唐末至宋初的宗白诗风

陈毓文

(闽江学院 中文系,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把握唐宋之际的诗歌变化,白居易是一个关键人物。由唐入宋,文人对白居易的学习经历了一个由讽谕转向闲适又复归讽谕的变化过程。受战乱影响,唐末五代初的诗人们与白居易诗讽谕精神产生共鸣。五代中后期,效法白居易的闲适诗风成为主流,并一直延续到北宋初。在北宋初的闲适诗风之外,王禹偁则自觉以白诗讽谕精神为创作导向,并进一步由学白转向学杜,从而揭开了宋诗发展的序幕。

**关键词:**白居易;唐末至宋初;诗歌;风格

中图分类号: I207.2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2)03-0083-06

### Poetry style betwee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HEN Yu-wen

(Chinese Department, Min Jiang College,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Bai Juyi is an important person who affected the poetry betwee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rom Tang Dynasty to Song Dynasty, literati learned from Bai Juyi and experienced a shift from allegorical to leisure and to allegorical finally. Affected by the chaos caused by wars, the literati between Tang and Five Dynasty studied the allegorical spirit of Bai Juyi. In the middle of Five Dynasty, leisure poetic style became the mainstream, and lasted until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Wang Yucheng consciously learned from Bai Juyi and Du Fu, reveal the development prelude of the Song poetry.

**Key words:** Bai Juyi; period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Song Dynasty; poetry; style

从唐末五代宋初诗坛主流的风气变化来看,诗人们的诗学追求大体表现为三个走势,即学元白、姚贾、温李三派。但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白居易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则越来越高。由唐末入五代,白居易诗歌的通俗化倾向影响渐大。更为重要的是,白居易所开创的中隐的处世方式逐渐成为处在险恶政治环境中的五代士人奉行的准则。入宋后,白氏诗风更是盛极一时。贺中复《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将五代十国时期宗白诗以后唐灭亡(936年)、南唐开国(937年)为界分作前后两期<sup>[1]</sup>,但贺先生所论只到960年为止,对唐末及宋初宗白诗风

的变化言之不详。其他关于白居易在此期影响的论述则大多集中于白居易与宋代文学尤其是与宋初诗歌之间的联系,如赵艳喜《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将王禹偁列为宋初白居易接受的至高点(《齐鲁学刊》2007年6期);王锡九《白居易与宋诗》则聚焦于白居易诗歌在宋代的接收(《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3期);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主要考察宋初诗人对白居易唱和诗、讽谕诗的接受(《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4期)。然而,唐末五代宋初是唐型文学向宋型文学转变的桥梁,其文学发展自成段落。此期文人对白居易的学习也相应经历了一个由讽谕(唐末五代初)转向闲适(五代中后期)最后又由闲适向讽谕转向(北宋初)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过程明显表现出连续性、阶段性的特点,不可轻易割裂。为此,笔者拟结合唐

收稿日期: 2012-02-12

作者简介:陈毓文(1973—),男,福建龙海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末五代宋初的时代背景和诗歌创作,探讨这一时期文人对白居易诗风的继承和发展。

### 一、唐末五代初浓郁的讽喻色彩

唐末五代初,白居易的诗歌在文人接受视野中主要还是以他的讽喻诗为主。尽管世俗所崇尚的是其闲适之作,是他与元稹的五七律绝等“小碎篇章”以及“驱驾文字,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sup>[2]</sup>。但是这种崇尚主要是发生在民间,正统文人对此并不太看重,如杜牧就斥之为“纤艳不逞。非庄人雅士所为”,甚至感慨“吾无位,不得用法治之”<sup>[3]</sup>。张为作《诗人主客图》,奉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把重心放在其以教化为主的讽喻诗上,其所举诗例也主要以讽喻诗为主。在割据局面形成以后,文人由于时势所迫,不得不四处漂泊,依附于各割据政权。尽管他们对朝廷已经逐渐不抱希望,但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用世思想却并未完全丧失。他们仍然在诗文中不遗余力地高倡儒家传统。<sup>①</sup>在这种情况下,白居易“惟歌生民病”(《寄唐生》)<sup>[4]</sup>和“以歌泄导人情”(《与元九书》)<sup>[5]</sup>的讽喻诗进入了文人的视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秉承白居易早期诗“先向歌诗求讽刺”(《采官诗》)<sup>[4]</sup>的讽喻精神,纷纷以自己的创作表达对现实的关注。走在前头的当属“香山之替人”(郑方坤《五代诗话·例言》)的韦庄。韦庄远绍杜甫,近学白居易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此期诗歌广泛涉及晚唐社会现实,具有浓厚的诗史意味,如《秦妇吟》就具体描写了他从长安脱身前后的亲身见闻,多角度深刻反映了战乱给当时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而《辛丑年》一诗则写黄巢入长安后纵兵屠杀的情景:

九街漂杵已成川,塞上黄云战马闲。但有嬴兵填渭水,更无奇士出商山。田园已没红尘里,弟妹相逢白刃间,西望翠华殊未返,泪痕空湿剑文斑。<sup>[4]</sup>

抒写了对当时藩镇拥兵相望、皇室播迁的深沉感慨。其他如《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重围中逢萧校书》、《闻官军继至未睹凯旋歌》、《赠戎兵》、

《壶关道中作》等诗在咏时伤乱当中也均表现出了较强的批判性。

罗隐的诗歌则在学习白居易讽喻精神的基础上,以其咏史诗进一步发展了诗歌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尽管他的一生多在奔波流离、干谒科考当中度过,但“兼济天下”却始终是其人生目标,他以《馋书》为干谒工具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透露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不屈意志。罗隐也因此能直承白居易诗歌的讽谏精神,于缘情体物的同时不忘刺时谏戒。如当头棒喝,讽谏高骈的《后土庙》:

四海兵戈尚未宁,漫劳淮海写仪形。九天玄女犹无圣,后土夫人岂有灵?一带好云侵鬓绿,两层危岫拂眉青。韦郎年少知何在,端坐思量太白经。<sup>[4]</sup>

对高骈迷信方术的行为进行了大胆的嘲讽,差点惹来杀身之祸。<sup>②</sup>当然也不乏委婉含蓄之作,如其《炀帝陵》:

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sup>[4]</sup>

语气平淡,寓意却极深。不管是哪种方式,诗中都渗透着强烈的议论色彩。这种长于反思议论的手法对宋诗理性精神的出现有着重要意义。

贯休的诗在昭宗光化二年就得到吴融的极力称赞,甚至称其为白居易的衣钵传人,“太白乐天既歿,可嗣其美者,非上人而谁?”<sup>[2]</sup>贯休在诗歌创作中也屡屡提及自己“十载独扃扉,唯为二雅诗”(《偶作》)<sup>[4]</sup>、“何妨成五色,永愿助风骚”(《笔》)<sup>[4]</sup>的创作价值取向。其乐府体诗也颇得元白新乐府诗之旨趣,“所长者歌吟,讽刺微隐,存于教化,体调不下二李白贺也”<sup>[6]</sup>。其《公子行》三首<sup>[4]</sup>:

锦衣鲜华手擎鹞,闲行气貌多轻忽。稼墙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

自拳五色裘,进入他人宅。却捉苍头奴,玉鞭打一百。

面白如削玉,猖狂曲江曲。马上黄金鞍,适来新赌得。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骄奢公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实质。而《富贵曲二首》则把矛头直接指向整个腐

朽的贵族阶层，可谓深得白居易讽谕精神真传<sup>[4]</sup>：

有金张族，骄奢相续。琼树玉堂，雕墙绣毂。  
纨绮杂杂，钟鼓合合。美人如白牡丹花，半日只舞  
得一曲。乐不乐，足不足，终教他爱山青水绿。

如神若仙，似兰同雪。乐戒于极，胡不知辍。  
只欲更缀上落花，恨不能把住明月。太山肉尽，东  
海酒竭，佳人醉唱，敲玉钗折。宁知耘田车水翁，  
日日日炙背欲裂。

贯休的这类立足于颂美讽刺，劝善惩恶的诗作  
受到了宋人的极大褒扬。

唐末五代初的宗白诗人主要以韦庄、罗隐、贯  
休为代表，他们继承了白居易前期作品中指陈时事  
的讽谕精神，同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又有了新的发  
展。除了这三人外，当时宗白诗人还有郑谷、杜荀  
鹤、黄滔、徐夔、卢延让等，相比于韦庄、罗隐、  
贯休三人，他们学白更多是偏重于其他方面，此处  
不赘。<sup>③</sup>

## 二、五代中后期的闲适主题

五代中期，由唐末入五代的前辈诗人已基本凋  
零殆尽，白诗的讽谕精神也后继乏人。成长起来的  
新一代文人普遍没有经历过动乱，而从唐末五代初  
就已经在文人心中扎根的顺时委运、及时行乐的时  
代心理则逐渐成为主导。动乱造成的文化衰落亦使  
通俗诗风盛行。文人学白重心随之发生改变，悠闲  
自适、知足常乐成为诗歌表现主题。冯道与李建勋  
作为此期南北仕宦文人的代表，他们的心态与诗歌  
创作明显体现了此期文人对后期白居易的接受。

冯道一生历五朝八姓<sup>④</sup>，号称不倒翁，历史上  
对其评价也褒贬不一。史家多持批评意见<sup>⑤</sup>，可时  
人却不以为非，“道既卒，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  
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sup>[7]</sup>把他和孔子相  
提并论，评价不可谓不高。这种评价在反映了时代  
心理的同时，也为当时士人接受白居易后期独善其  
身的中隐思想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五代武夫专  
政的政局也决定了白居易诗中的讽谕精神在新一  
代文人当中缺乏继承者。此时五代文人的处境比之

五代初期并没有多大的改善，文人仍然处在危险的  
境地之中，讽谕劝谏的结果往往容易惹来杀身之  
祸。<sup>⑥</sup>在这种情况下，后期白居易闲适自足、明哲  
保身的做法自然成为多数文人的共同选择。冯道以  
其仕宦多朝而始终屹立不倒的事实成为北方仕宦  
文人学白的典型代表。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当时  
许多碌碌苟安的文人，冯道并不是一味地迎合君  
主，而是与白居易一样，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  
作一些实事。<sup>⑦</sup>冯道留存诗歌很少，仅存五首诗与  
四残句，大都通俗流畅，诗中所表现出的思想与后  
期白居易明显有着相通之处。如：

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  
问前程。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  
天道甚分明。（《天道》）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  
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  
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偶作》）<sup>[5]</sup>

相比于冯道而言，存诗较多的李建勋无疑更具  
有典型性。作为一个清醒的政治家，李建勋虽数次  
拜相，却始终游离于政治之外。<sup>⑧</sup>君主猜忌的政治  
处境使他自觉向白居易靠拢，在个人与朝廷关系处  
理上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诗歌创作上也相应较多  
承继白居易闲适诗的自足情怀，远离对国计民生的  
关注，流连于士大夫之间的酬唱赠送，感伤春光易  
逝，提倡及时行乐。具体来说，白居易“元和体”  
诗注重于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品味悠闲乐趣，抒写文  
人远离社会政治的个人生活情怀，诗风浅易轻俗。  
李建勋的诗歌亦多以其仕宦生活为题材，其所表现  
出的闲适清雅的风格更与白居易后期诗歌一脉相  
承。试看几首：

天时人事常多故，一岁春能几处游。不是尘埃  
便风雨，若非疾病即悲忧。贫穷心苦多无兴，富贵  
身忙不自由。唯有分司官正好，闲游虽老不能休。  
（白居易《勉闲游》）<sup>[4]</sup>

州中案牍鱼鳞密，界上军书竹节稠。眼底好花  
浑似雪，瓮头春酒漫如油。东君不为留迟日，清镜

唯知促白头。最觉此春无气味，不如庭草解忘忧。  
(李建勋《春日尊前示从事》)<sup>[4]</sup>

坐安卧稳與平肩，倚杖披衫绕四边。空腹三杯卯后酒，曲肱一觉醉中眠。更无忙苦吟闲乐，恐是人间自在天。(白居易《闲乐》)<sup>[4]</sup>

携酒复携觞，朝朝一似忙。马谏频到路，僧借旧眠床。道胜他图薄，身闲白日长。扁舟动归思，高处见沧浪。(李建勋《闲游》)<sup>[4]</sup>

虽然“州中案牍鱼鳞密，界上军书竹节稠”，但他关心的却是“眼底好花浑似雪，瓮头春酒漫如油”，似乎看赏春光、及时行乐就是这位达官贵人生活的全部。这种安位守常的平庸趣味两人何其相似！虽有诗歌形式上的差异，但在情感状态与艺术风貌上却几乎没什么区别，同样是关心一己的生存状态，表达的是对优游卒岁的诗酒生活的自得与惬意，语言平易，情思淡薄。

此外，从南唐文坛看，“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sup>[8]</sup>唱和之风盛行，白居易吟咏情性的闲适诗亦成为效法榜样。徐铉在《成氏诗集序》中就明确主张：“诗之旨远矣，诗之用大矣……陈诗之职，物情上达，王泽下流。及斯道之不行也，犹足以吟咏情性，黼藻其身。”其诗也颇“具元和风律”(《宋诗钞小传》)；冯延巳也被“识者谓有元和诗人气格”。<sup>[8]</sup>可以这么认为，作为五代中期南北诗坛的代表，冯道、李建勋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五代中期文人诗歌创作的导向。尽管此时还有诗人追步姚贾、温李，但白居易的诗学影响已经远超姚贾、温李二派诗风。

### 三、北宋初王禹偁对闲适诗风的反拨

鉴于武夫专权带来的弊端，北宋初统治者大力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宋太祖登基不久就下令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师之像，亲自为孔子作赞文，并率群臣谒孔庙，表达了尊奉儒学的政治愿望。宋太宗秉承这一国策，也大力推行文治，重用文臣，大开科举。这一策略的实施在促成宋代文化逐渐走向繁荣的同时，也滋生了急功躁进的社会心理。有鉴于此，黄老

思想得到统治阶级的宣扬，恬淡知足的处世心态屡屡得到提倡。“(张)洎因揣摩上意，上疏称述，凡数千言。上览而善之，赐诗嘉奖，召宰相等命坐于崇政殿西庑，谓曰：‘张洎所上表深喻朕旨，足以戒躁竞之辈，殄浇薄之风矣，令付史馆。’许众人就观，因嗟叹流俗不安义命者久之。”<sup>[9]</sup>宋初统治者的言行直接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为臣者不需要多么能干，只要能安分守己，做好本职工作即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社会的主流风尚主要表现为崇尚闲适，追求一种安闲稳逸的生活方式。承五代中期文人效法白居易闲适之作的风气，此期自上而下掀起了新一轮学白的热潮。宋太宗本人就非常欣赏白居易，其诗歌创作亦多有取法，可谓宋初最大的白体诗人。上行而下效，“宋初诸子，皆祖乐天”<sup>[10]</sup>、“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sup>[11]</sup>太祖、太宗朝最受宠渥的当属李昉，其温和谨慎、知足恬淡的个性深合太宗心意，被视为“师长庶僚，聿为外廷之表”<sup>[12]</sup>，树为朝臣典范。而李昉本身也是白居易的忠实追随者，其“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sup>[13]</sup>“为文章慕白居易，尤浅近易晓”。<sup>[14]</sup>从言行到诗文创作，对白居易可谓亦步亦趋。<sup>[15]</sup>然而，李昉学白只学其闲适，诗文创作上也只是一味的模仿，未能树立自己的创作风格。

北宋初，在较多注重于对白氏闲适诗风效法的主流之外，王禹偁诗歌因为对白居易讽谕精神的重新阐释与接受而独树一帜，揭开了宋诗发展的序幕。可以说，这一时期真正能学白而又转益多师，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诗人非王禹偁莫属。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王禹偁进士及第，授成武主簿。后改任大理评事知长洲县。长洲县隶属苏州，为原苏州刺史白居易辖内。这四年任职期间王禹偁主要模仿白居易的吏隐方式，过了一段“政事还多暇，优游甚不羁”的生活。这种情况在988年被召回京师后发生了改变。在右拾遗任上，王禹偁积极履行谏官职责。与白居易不同的是，王禹偁此后虽屡遭贬谪，但关心民瘼的讽谏精神却始终不

变。他深为“君恩无路报，民瘼无术疗”（《月波楼咏怀》）而感到惶愧（本文所选王禹偁诗文均参见《小畜集》，上海书店影印涵芬楼《四部丛刊》初编本，1984），进而自责：“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辞，岂得为良吏？不耕一亩里，一持一只矢。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空作对雪吟，勤勤谢知己。”（《对雪示嘉祐》）在这一心理驱动下，白居易“直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在王禹偁那里重新焕发了活力。在诗中，王禹偁既针刺时弊，痛斥北宋攻取南唐江州后的屠城暴行：“弥年城乃陷，不使鸡犬活。老少三千人，一怒尽流血”（《金吾》），也对当时老百姓所承受的苦难深深同情。《感流亡》一诗就展示了一幅饥民流离失所的图景：“门临商于路，有客栖檐前。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恻恻一夫鰥。道粮而斗粟，路费无百钱。聚头未有食，颜色颇饥寒。试问何许人，答云家长安。去年关辅旱，逐熟入穰川。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唯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既写农民冬旱逢雪的喜悦：“腊雪连春雪，商民舞且歌。数年求不得，一尺未为多”（《赋得腊雪连春雪》），也写久雨成灾带来的悲伤：“秋来连澍百日雨，禾黍飘溺多不收。如今行潦占南亩，农夫失望无来斲。尔看门外饥饿者，往往僵殍填渠沟”（《对雪示嘉祐》）。他在淳化二年冬末写的《畚田词》五首，更是用平易通俗的民间口语，描绘商州当地农民“更互力田”的淳朴风尚。试看几首：

大家齐力鬪孱颜，耳听田歌手莫闲。各愿种成千百索，豆箕禾穗满青山。（其一）

鼓声猎猎声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其三）

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刀耕岂有偏。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少荒田。（其四）

对于这组诗的创作目的，其《畚田词》序有云：“其词则取乎俚，盖欲山民之易晓也。”真可谓是白居易“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的翻版。

但是，王禹偁毕竟不同于白居易，王禹偁并不像白居易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是如其《小畜集序》所云“君子以自强不息，是禹偁修辞立诚，守道行己之义也”。越是遭受挫折，就越是正道直行，自强不息。他重视儒教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教化作用，但并不主张把文章变成宣传儒家思想的教化工具，而是提倡转益多师，“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赠朱严》）、“篇章取李杜，讲贯本姬孔。古文阅韩柳，时策开晁董”（《寄题陕府南溪兼简孙何兄弟》）、“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吾将见子以文显于时也”，王禹偁的一生正体现了这种追求，不管穷达，都要积极用世。也正因此，王禹偁发现了白居易与杜甫在现实主义传统上的渊源，从而引导宋人由学白进而学杜，为奠定杜甫在宋代诗学中的重要地位打下坚实基础。

王禹偁在诗歌创作方面转益多师，既学白又能跳出白氏诗风的束缚，改变了宋初诗坛“杯酒光景”的唱和之风与“搜奇抉思”的苦吟风气，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深关注赋予了诗歌健康开朗的思想基调，将白诗中的讽谕精神与平易自然的语言追求结合起来，可以视为对弥漫于当时文坛的五代诗风的第一次反拨，也是具有宋诗平易面目的第一次展现。尽管他的创作并不能马上扭转诗歌发展方向，却揭开了宋诗发展的序幕。进入真宗朝后，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创作则从另一个层面表现了类似的努力，但这已经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了。

#### 注释：

① 如吴融在为贯休《西岳集》所写的序言称白居易的讽谕诗为“一时奇逸极言”，其出发点，还在传统的诗教：“君子萌一心，发一言，亦当有益于事。矧极思属词，得不动关於教化？”（《全唐文》卷820，3831页）黄滔在其《答陈蟠隐论诗书》中更是高举诗歌的教化大旗，标举出李杜元白四大家为创作榜样，并注重对白居易诗歌的讽谕精神作了肯定：“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全唐文》卷823，3844页）。

② 据《十国春秋》卷84载：“隐与顾云谒淮南高骈，隐见骈酷好仙术，潜题《后土庙》刺之，连夕挂帆而返。巫

- 者告駢，駢怒，急发棹追之，不及。”（《五代史书汇编》4499页，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 ③ 贺中复《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中有关于五代前期宗白诗人的详细论述。见《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 ④ 《资治通鉴》卷291胡三省注：五朝，唐、晋、辽、汉、周；八姓，唐庄宗、明宗、潞王各为一姓、石晋、邪律、刘汉、周太祖、世宗各为一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⑤ 如欧阳修说他“可谓无廉耻者矣”（《新五代史》卷54，611页）；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291《后周记二》中称他“乃奸臣之尤”（《资治通鉴》卷291，2026页）。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则说：“道之恶浮于纣，祸烈于跖。”（《读通鉴论》卷29《五代中》）
- ⑥ 如后唐时宁江军节度使西方邨出身武人，“所为多不中法度”，因不喜判官谭善达屡次劝谏，就“遣人告善达受人金，下狱”，竟使其冤死狱中（《旧五代史》卷61《西方邨传》，824页）；后晋华州节度使张彦泽因从事张式小逆其意，竟“决口割心，断手足而死之”（《旧五代史》卷98《张彦泽传》，1306页）；后汉太祖刘知远则尝言“朝廷大事不可谋及书生，懦怯误人”（《资治通鉴》卷289，2008页）；其权臣史弘肇说得更为露骨：“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又说：“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毛笔），焉足用哉！”（《旧五代史》卷107，1405-1406页）
- ⑦ 对冯道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史家所记也多有矛盾之处。对此，我们一方面不否认其性格中不乏苟安谀上之缺点，但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冯道所作所为还颇有值得称道之事。如后唐明宗时“岁屡丰熟，中国无事”，冯道劝诫明宗应居安思危：“臣为河东掌书记时，奉使中山，过井陘之险，惧马蹶失，不敢怠于衔辔，及至平地，谓无足虑，遽跌而伤。凡蹈危者虑深而获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手段委婉；及明宗又问“天下虽丰，百姓济否”时，冯道又以聂夷中之诗相劝，其“谷

贵饿农，谷贱伤农”（《新五代史》卷54）的回答实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反映。

- ⑧ 如《江南余载》卷下所载：“冯延巳、李建勋拜相，张义方献诗曰：‘两处沙堤同日筑，其如启沃藉良谋。民间有病谁开口，府下无人只点头。’”（《五代史书汇编》5115页）。在南唐党争日益尖锐化的时候，他始终能不卷入其中，连宋齐邱都对他深表佩服，“宋齐邱当国，深忌同列。少所推逊，独称建勋曰：‘李相清谈，不待润色，自成文章。’”（《十国春秋》卷21，《五代史书汇编》3705页）

#### 参考文献：

- [1] 贺中复. 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J]. 中国社会科学, 1996(5): 56.
- [2] 董 诰. 全唐文[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3] 杜 牧. 樊川文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4] 彭定求. 全唐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5] 白居易. 白居易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6] 释赞宁. 宋高僧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7] 欧阳修. 新五代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8] 傅璇琮, 徐海荣. 五代史书汇编[M].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4.
- [9] 李 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10] 胡震亨. 唐音癸签[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11] 蔡 启. 蔡宽夫诗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2] 曾枣庄, 刘 琳. 全宋文[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8.
- [13] 吴处厚. 青箱杂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14] 脱 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5] 赵艳喜. 白居易在宋初的“影子”——论白体诗人李昉与白居易[J]. 殷都学刊, 2008(2): 62-66, 156.

责任编辑: 曾凡盛